

中國大陸的改革路徑與意涵*

李 和

(美國 Merrimack 學院政治系副教授)

摘 要

在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提出「歷史的終結」十五年後，歷史似乎並未走向終結。同時，歷史告訴我們西方式現代化的發展途徑仍然不斷地受到挑戰。近年來，兼顧經濟成長與政治穩定的「中國模式」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隨著中國國力進一步增長，這種發展模式對某些轉型和開發中國家可能會更具有吸引力。本文主要分析中國經濟與政治轉型。本文第二節論述中國改革的主要特點；第三節檢視中國改革缺陷與侷限性；本文第四節探討中國改革的模式對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啟示。

關鍵詞：發展模式、經濟改革、軟威權主義、政治自由化、中國大陸、政治改革、民主化、政體轉型

* * *

一、前 言

在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提出「歷史的終結」十五年之後，歷史似乎並未走向終結^①。同時，歷史告訴我們西方式現代化的發展途徑仍然不斷地受到挑戰。如果仔細分析中國大陸的轉型過程，如從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以及從硬威權主義轉向軟威權主義，就可以發現一些非西方的發展途徑似乎也值得其他開發中國家借鏡。

我們都知道，震盪療法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前蘇聯與東歐國家已經宣告失敗。然而，整個世界仍然在狂熱地找尋產生「可持續增長」(sustained growth)的新模式、新策略。許多開發中國家認識到經濟與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同時逐漸瞭解減少政府干預經濟、擴大政治開放程度的重要性。然而，人們對於改革的策略仍然無法形成一致看法，

* 本文根據作者在美國政治學二〇〇二年年會上宣讀之論文增訂而成。作者要在此感謝美國 YAS 公司為這一研究專案提供的資助 (YAS Corporation Faculty Fellowship)。在本文寫作期間，作者得到許多中外學者的啟發，包括 Joseph Smith、劉國立、張森根、江時學、鄒藍、張保會、郭保綱、鄧小綱、蔣成等。

註①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1989), pp. 3~18.

例如改革的速度要多快、改革的順序要如何安排，以及改革的幅度要多大等等。

學界至今仍持續辯論什麼才是最成功的改革策略，也就是說，何種改革策略可以在國家經歷嚴重的衰退之後，成功地將經濟引導到「可持續增長」的方向。雖然學界都同意總體經濟穩定、貿易與價格自由化是必要的步驟，但對於下列五項議題的答案仍是眾說紛紜：一、改革速度要激進或是漸進；二、改革的順序如何安排；三、何者應該包含在制度改革之中、制度改革的最佳時機，以及什麼才是最佳的制度安排；四、決策者是否要緩和改革所帶來的分配結果，或是要緩和到什麼程度；五、最根本的問題是改革帶來的經濟後果是否會偏離預設目標，包括國家能力與貿易失序等問題^②。

一些國家改革失敗後，整個經濟也跟著崩潰，因此至今仍然身處混亂與貧困之中。不過，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成就卻與東歐國家動蕩不已的經濟狀況形成強烈對比。珠江三角洲流域已經成爲一座世界工廠，宛如十九世紀的曼徹斯特^③。

新自由主義式改革在開發中國家（如阿根廷）的失敗，已經迫使世人重新反省過去是否過於盲目相信市場機制。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兼顧經濟增長與政治穩定的「中國模式」顯得特別令人心動。隨著中國國力的大幅度提升，這種發展模式對開發中國家更具有吸引力。在全球政經局勢不斷動蕩的今天，只有少數國家能向中國大陸一樣，在享有低通貨膨脹的同時，仍能保持高成長率與持續穩定^④。僅僅這一個理由，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就已經成爲西方民主政治的一個潛在競爭對手。另一個足以讓西方國家戒慎恐懼的理由是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不斷地在增強，而且整體來說民衆對中共政權接受度仍然很高^⑤。

最近，中國大陸的改革策略已經被渲染成相當成功的模式——無論從經濟發展或是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一些學者指出，中國大陸漸進式的改革已經表明，中國改革只有贏家而沒有輸家^⑥。當這種中國式的第三條路用來挑戰Joseph Stiglitz等人爲「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建構的理論基礎時，特別能顯示出它在規範性（normative）、政策上的重要性^⑦。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Paul D. Wolfowitz）

註② Valerie Bunce,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4 (2001), p. 48.

註③ "A New Workshop of the World," *Economist*, vol. 365, no. 8294 (October 12, 2002), p. 37.

註④ 對這個主題的詳細討論，可參考 Dingxin Zhao, "China's Prolonged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Future: Same Political System, Different Policies and Method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8 (2001), pp. 427~444.

註⑤ Andrew J.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2003), p. 13.

註⑥ 對這個主題的詳細討論，可參考 Lawrence Lau, Qian Yinyi, and Gerald Roland, "Reform without Losers: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ual 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8, no. 1 (February 2000), pp. 120~143.

註⑦ Yasheng Hua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forms: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rom China," *Cato Journal*, vol. 21, no. 1 (spring 2001), p. 62.

參訪亞洲時提出中國為北韓提供了一個可以仿效的模式^⑧。顯然，後毛時期的中共威權政權已經成爲一個不同於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⑨。

在文革期間，中國大陸積極地向開發中國家推銷「自力更生」、「人民戰爭」等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法寶」，許多外國領導人被邀請參觀延安、井岡山等中共革命聖地^⑩。然而，現今中共領導人並不強調中國大陸的改革模式是開發中國家的典範。鄧小平用「摸著石子過河」精闢地概括了中國的改革模式^⑪。這種改革沒有明確的目標和方向，每一項具體的改革措施都是對迫在眉睫的危機做出的應急性反應。

事實上，北京希望讓其他轉型中的國家能仿效中國大陸的模式。舉例來說，北京害怕北韓政權的崩解與越南政權的不穩定造成中國大陸邊境上的動蕩。北京也希望古巴採取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政策，以維持古巴政權的穩定。一九九二年大陸曾派出特使試圖說服卡斯楚進行中國式經濟改革，讓古巴擺脫民不聊生、陷入瀕臨崩潰邊緣的命運^⑫。北京正悄悄的向其他國家灌輸它的改革模式，以維持中國大陸的利益。像葉爾辛、卡斯楚、金正日等外國領導人，都曾被安排去參觀象徵中國大陸改革成就的經濟特區。據報導，卡斯楚要求古巴仿效中國大陸的改革路線，其他古巴高階官員亦希望遵循中國模式進行改革^⑬。在二〇〇〇年五月，北韓領導人金正日訪問中國大陸時，就在江澤民的陪同下，參訪了一個對外開放與經濟改革造就出來的耀眼巨星——浦東。

與其他發展軌跡相比，中國大陸在經濟改革方面表現優異，但在政治改革的成果卻是相當有限。這個現象讓人產生兩個令人深思的問題：一、中國大陸的改革路徑可以導致政治自由化，甚至是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嗎？二、中國大陸可以在缺乏民主政治的情況下，穩定發展經濟嗎？腐敗、高失業率、貧富差距擴大、社會不安等等問題促使人們從更新穎、更具批判力的觀點檢視中國大陸的改革模式的利弊得失。雖然吾人仍然無法精確地預測中國大陸政治轉型的結果，但它的重要性已經讓人不得不重新評估中國大陸改革的動力與面對的兩難困境^⑭。

註⑧ Sonni Efron, "US Points to China as a Model for North Korea to Copy," *Boston Globe*, June 1, 2003, p. A3.

註⑨ Dmitry Shlapentokh, "Post-Mao China: An Alternative to 'The End of History'?" *Communist &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5, no. 3 (September 2002), p. 239.

註⑩ 延安和井岡山被認爲是中國的「革命聖地」。

註⑪ Susan L. Shirk, *How China Opened Its Door: The Political Success of the PRC's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Reform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p. 27.

註⑫ 唐典偉，「北京特使說服卡斯楚改革秘辛」，*世界周刊*，2001年12月16日，頁38~39。

註⑬ 古巴副總統、革命武裝力量（FAR）部長兼陸軍總司令 Raul Castro，於1997年參觀中國；國家會議秘書 Carlos Lage 於1992、1993年和1999年參觀中國。政治局委員兼副總統 Jose R. Machado Ventura 於1999年參觀中國。Ricardo Cabrizas 部長甚至數度率領古巴的「政府內部聯合委員會」（Sessions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Joint Commission）參訪中國。

註⑭ Cheng Li, *Rediscovering China, Dynamics and Dilemmas of Refor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7).

中國大陸的經濟奇蹟使過去關於民主與經濟發展關係的辯論有了新的轉折。中國大陸的經驗似乎挑戰早期「民主有利於經濟發展」(democracy-is-good-for-development)論調。過去二十年來，無論是經濟學者或是政治學者都十分關注中國大陸改革^⑤。然而，不同理論對於中國大陸改革成就的分析與詮釋，卻很容易誤導第三世界國家的決策者。經濟學者認為成長導向(growth-oriented)的漸進式改革是促成中國大陸成功的關鍵因素，然而政治學家卻將中共政權實施的「軟威權主義」視為經改成功的要件。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中國研究專案的負責人裴敏欣博士認為，中共雖然將經濟改革當作首要目標，但這些改革終將引導中共政權的政治轉型^⑥。由於無論是經濟學者或是政治學者都只著重一部分現象，使得中國大陸改革的總體現象仍然沒有完整地呈現出來。為了避免重覆同樣的過失，本文不但探討政治變遷，也分析經濟上的巨大變化。

本文主要分析近來中國大陸經濟與政治轉型。第二節檢視中國模式的主要特徵；第三節分析中國大陸改革模式的限制以及這種模式延滯政治改革的原因；第四節探討中國大陸改革模式對其他開發中及轉型國家的啓示。最後一節則提出本文的結論。

二、中國改革模式的特徵

不少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大陸的改革是漸進的適應過程，北京從未有一個固定的先驗模式，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改革藍圖。回顧近二十多年中國改革的歷程不難發現中國大陸的改革模式有三個基本特徵：一、經濟成長兼顧持續政治穩定、軟威權主義(soft-authoritarianism)；二、經改先行政改滯後的路徑；三、一黨獨大的政黨制度(inclusionary dominant party system)。

(一) 政治穩定下的經濟增長

很多政治學者認為，一個政權要保持正當性與穩定性，必須達到幾個重要目標。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經濟成長。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形下，能夠達到經濟繁榮的政府就會被認為可以繼續執政下去；反之，政府若無法解決發展停滯的困境，就失去統治的合法性基礎。文革動亂後，大陸開始進行改革開放。然而，諷刺的是，現在中共雖然坐擁革命遺產，但它的表現像是一個執政黨，而不是革命黨。

中共意識到成功的轉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有賴於經濟增長的成敗。在後毛澤東時期，中國大陸一直享有持續的經濟成長與政治穩定。政治穩定雖然是政治學的傳統概念，但迄今大家對它的內涵仍有不同的解讀。因此，我們有必要先弄清它的內涵。為

註⑤ Justin Yifu Lin, Fang Cai, and Zhou Li,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註⑥ Minxin Pei,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什麼一個政權持續存在，或者為什麼發生以和平或暴力方式進行轉型，始終是政治學者探討的一個重要議題。然而，現有文獻往往透過回答「什麼是不穩定」的方式，來回答「什麼是穩定」的問題^①，這樣的回答無法使人滿意。

根據康曉光的分析，中國大陸媒體對於政治穩定一詞有四種不同的用法，分別是領導人的穩定、政策的穩定、政權的穩定，以及整個政治系統的穩定^②。梅兆贊（Jonathan Mirsky）認為，「穩定意味由元老以及共產黨在毫無競爭情形下建立的統治秩序。」^③在本文中，政治穩定被界定為政府能長期牢固掌握政權，並具有合法性的政治秩序。

儘管這些年來許多人一直在預測中國即將崩潰，但中國大陸卻仍然保持穩定。自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實施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大陸的「實質國民生產毛額」（real GNP），於一九七九至一九九四年間，以近百分之十的年成長率，成為世界上經濟成長率最快的國家之一。自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實質國民生產毛額」每七年就「翻一番」^④。前幾年，在亞洲許多國家遭受財政危機與疫情衝擊的時刻，中國大陸的「實質國民生產毛額」在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一年間，仍達成百分之六點五的高成長^⑤。二十五年前，中國年進出口貿易總額為 206 億美元，二〇〇三年已達到 8,512 億美元。二十五年前，中國外匯儲備為 1.67 億美元，二〇〇三年已達到 4,033 億美元。目前，中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六，進出口貿易總額居世界第四。中共十六大確定的目標是到二〇二〇年時，中國國內生產毛額比二〇〇〇年時再翻兩番，即由二〇〇〇年的 1 萬億擴大到二〇二〇年的 4 萬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毛額達到三千美元^⑥。中國大陸在推動以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之際，持續擴大對外開放的程度。中國大陸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得中國的產品更容易進入海外市場。不同於西方對中國即將崩潰的預期，全球化有助於中共維持高經濟成長，強化中共政權。強有力的威權體制提供外國投資者與中國大陸民衆一種穩定與安全的感覺。中共儘管壓制政治自由，但也嘗試抑制造成人民與財產損失的犯罪活動。坦白來說，這種穩定有助於吸引外國投資^⑦。經濟快速發展，回收香港和澳門，以及加入

註① 關於探討「穩定」與「不穩定」的經典學術著作，可參考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另外，對於探討「暴力性不穩定」（violent instability）的文章，可參考Tomas Greene, *Comparativ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Search for Theory and Justice*,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0)。

註② 康曉光，「未來三～五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戰略與管理*（北京），第3期（2002年3月），頁1～15。

註③ Jonathan Mirsky, "Revolution's Dark Legacy," *Asia Weekly*, vol. 27, no. 2 (January 9, 2001), p. 22.

註④ Raphael She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 Experiment in Pragmatic Socialism*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0), p. 55.

註⑤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2), p. 234.

註⑥ Shlapentokh, "Post-Mao China," p. 246.

註⑦ 對這主題的詳盡討論，可參考 Barry Sautman, "Sirens of the Strongman: Neo-Authoritarianism in Recent Chinese Political Theory," *China Quarterly*, no. 129 (March 1992), pp. 72～102.

世界貿易組織使中共合法性下降的趨勢得到緩解。

顯而易見，成長與穩定是中國改革的兩個重要特徵。基於這個原因，我們把中國大陸的改革模式稱之為「政治穩定下的經濟增長模式」(growth-with-stability model)。政治穩定是中國大陸威權主義的重要特徵^{②④}。對鄧小平來說，穩定是中國大陸長期經濟發展與政治進步的先決條件，必須盡一切努力去維持它^{②⑤}。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民主意味著失序、混亂、無政府。早在大約一百五十年前馬克思(Karl Marx)就指出，維護獨裁專制的黨就是一個注重秩序的黨^{②⑥}。中共一直宣稱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事實上，鞏固自己的權位才是中共最關切的問題。

總之，自一九七〇年代末期所進行的經濟改革，基本上完成了一項史無前例的成就。自八九民運以來，北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杭廷頓(Samual P. Huntington)所謂的「政績合法性」來維持政治穩定，在政治改革方面躑躅不前。但是未來是否能繼續維持現有的政治穩定與經濟成長，則仍是一個未知數。

(二) 軟威權主義

與二十年前相比，中國的政治體制發生了深刻變化，極權主義體制也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軟威權主義體制。在整個鄧、江時期，中共廣泛探討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舉例來說，中共對臺灣與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印象非常深刻，對蘇聯與東歐共黨政權瓦解、臺灣的陳水扁與墨西哥的福克斯(Vincete Fox)勝選感到驚訝。中共研究其他國家的用意，就是想尋求一個可以同時維持市場經濟與政治控制的方法。

長期以來，新加坡一直是中國大陸發展的參考模式^{②⑦}。自一九六〇年代後，新加坡經濟連續幾十年高速成長。在一九九〇年代，新加坡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per capita GDP)已高於西歐的平均值^{②⑧}。中國大陸也亦仿效新加坡的做法，試圖結合自由市場與威權政府。這種做法，也就是眾知的「軟威權主義」。福山認為軟威權主義有兩種可供區別的特徵：一、軟威權主義把市場導向的經濟體系和強調說服的家父長式威權主義結合在一起。二、軟威權主義是一個強調集體利益優於個人利益的社群主義^{②⑨}。如今，軟威權主義的觀點已逐漸為中共所採用。康曉光認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和「三個代表」構成了新權威主義的官方版本。可以說，與市場經濟和

註② 引自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6.

註③ 對這個主題的詳細討論，可參考 Wei Pan, "Toward a Consultative Rule of Law Regime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2, no. 34 (February 2003), pp. 3~41; 蕭功秦，「新加坡的『選舉權威主義』及其啓示」，*戰略與管理*（北京），第1期（2003年1月），頁67~74。

註④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註⑤ Francis Fukuyama, "Asia's Soft-Authoritarian Alternative,"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vol. 9, no. 2 (spring 1992), pp. 60~61.

註⑥ 康曉光，「未來10年中國政治發展策略探討」，*戰略與管理*（北京），第1期（2003年1月），頁77。

註⑦ Phillip P. Pan, "A Study Group is Crushed in China's Grip: Beliefs are Tested in Saga of Sacrifice and Betrayal," *Washington Post*, April 23, 2004, p. A1.

權威政治相適應的意識形態框架已經形成^⑨。華盛頓郵報（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天安門廣場事件發生近十五年前和前蘇聯政權倒臺十三年後，中國共產黨進行一場全世界最大的、可能也是最為成功威權主義的實踐。

必須指出，自七十年代末開始的經濟改革中，中國引進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模式，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催生出嚴重的貧富分化。改革開放的成果為少數人截取，廣大民衆所得無幾，還要擔負改革的主要成本。但是推行軟威權主義的中國能壓抑矛盾、限制衝突，在一定時間內可以強行驅動整個社會向前。

一九九七年東亞金融危機使政府確信，市場經濟和全球化有很大的風險，必須妥善應對。二〇〇一年大陸「入世」後，北京的危機感與日俱增。這是由於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意味著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要進一步對外開放長期保護的農業、金融、保險、通訊等行業。若不深化改革，這些行業將無法應對來自海外的競爭，經濟危機有可能導致政治的不穩定。阿根廷金融危機（二〇〇一～二〇〇四年）為中南海再次敲響了警鐘。在這種情況下，北京在穩步開放的同時，對外部勢力的影響極為關注。學界發表一系列文章批判「新自由主義」，告誡當局要居安思危，警惕國際化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避免東亞和阿根廷危機後出現的社會動蕩。

（三）經改先行政改滯後的路徑

對於改革的途徑，可歸納為兩種。第一種是激進式（big bang）改革，強調徹底以民主政治取代共黨體制。第二種是漸進式改革，在共黨繼續保有權力的前提下，改革原有共黨體制。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途徑都可以在現今的世界中找到支持者^⑩。大部分東歐共黨國家採取激進式的改革路徑。俄國採取的是激進改革模式，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私有化同時進行。在這些國家中，全面的民主轉型出現之後，經濟改革才開始出現。但中國大陸、越南、古巴等共黨國家則採取漸進式改革路徑，在不觸及現存政治與社會基本體制的前提下，進行經濟改革，以維持共黨的統治^⑪。

許多西方專家認為共黨政權進行改革，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必須同時進行，不能分割。中國大陸的改革模式與這種見解截然不同^⑫。在蘇聯解體之後，中共吸取的教訓之一是改革要逐步進行，先經濟、後政治，先容易、後複雜。經濟改革先於政治改革可說是中國改革的一大特徵。如前所述，中共的合法性來自於它對經濟發展的承諾。

註⑨ Andrew Walder,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2 (September 1995), p. 263.

註⑩ Yu-Shan Wu,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a vs. Europe," *Issue & Studies*, vol. 38, no. 4/vol. 39, no. 1 (December 2002/March 2003), pp. 93~138.

註⑪ Christian Henning and Xiaobo Lu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Style Gradualism: A Paradox of Too Strong Private Interes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 156, no. 1 (2000), p. 36.

註⑫ Yan Sun, "Reform, State, and Corruption: Is Corruption Less Destructive in China than in Russi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2, no. 1 (October 1999), p. 2.

因此，雖然中國的政治改革幅度與速度遠遠落後於經濟改革，但市場經濟轉型在近期內不會動搖中共的權力結構。八〇年代發展經濟只是為提高人民生活和綜合國力。現在，發展經濟已經是中共執政合法性的主要來源。

與蘇聯等前共黨國家比較起來，中國在推動改革時更為小心謹慎。然而，中國的政治改革還是有所進展。當一九八〇年代經濟改革迅速展開後，中央政府的權威在鄉村與各省出現式微的跡象。這一方面是市場經濟力量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推動改革的決策者有意識地以間接手段、市場、權力下放等政策來取代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預。

有跡象表明中共力圖使政治體系逐漸適應市場經濟的新環境，並且使之逐漸制度化。在本文中，制度化是指不斷增加的政權結構明朗化、更有規範的決策過程，國家較少地干預市民社會^④。在一九八七年，中共採用新選舉法，提供某種程度的自由競爭選舉（差額選舉），規定在選舉中候選人的數目必須多於職位所需的數目。自此之後，中共逐漸實施基層直接選舉，汰換一些長期擔任地方領導職務的幹部。到目前為止，已有百萬鄉村舉行基層選舉，而每次基層選舉中都有將近五分之一的現任幹部遭到替換。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這是首度以鄉村作為試辦點，進行「差額選舉」（multi-candidate voting）。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中國創造了另一項歷史。自中共執政後，首度賦予大陸公民直選鎮級行政首長的權利。如果此項試驗成功，將可能鼓勵中共領導人逐漸將直接選舉的層次提高到縣級、省級，甚至全國層級。長久以後，民主選舉將可以成為中國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礎。當然，政改的速度十分緩慢。「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已通過多年，現在只能選舉一個村委會主任，鄉鎮一級的公開直選還停留在試點階段。此外，中國政改的道路是曲折的，有時甚至進一步，退兩步。

中共推動的改革並非一連串明確而有計畫的安排，而僅僅是在眾多的改革選項中，挑選阻力較少的路徑來進行改革^⑤。套句江澤民的話來說，這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改革。中共推動第一階段的經濟改革時，由於包括幹部在內的多數人在文革期間慘遭迫害、民不聊生，因此改革的阻力相對來說比較小。然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可能導致中共喪失政權，威脅到現有利益，其影響遠比單純的經濟改革來得大。這是中共遲遲不願意進行激進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此外，腐敗的官僚階層已經成為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政治體制改革早日進行比拖延滯後好，中共應該吸取清朝末年和國民黨倒臺之前的歷史教訓。

（四）統合其他一黨獨大的政黨制度

中國改革模式的另一項主要特徵是用「統合其他一黨獨大的政黨制度」取代「排斥其他的一黨專政」。在這種政黨體系中，中共是一個永久擁有統治地位的政黨，舉

註④ John P. Bur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50: National Political Reform," *China Quarterly*, no. 159 (September 1999), p. 586.

註⑤ Edward Friedman, "Is China a Model of Reform Success?" in Edward Friedman 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Socialist China*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95), p. 200.

世聞名的中國經濟改革是在現存中共與國家結構中完成。不同於多數前共黨國家直接廢除原來的黨國體制，在中國改革過程中，一些官員拋掉烏紗帽「下海」。與此同時政府淘汰冗員，將部分幹部轉移到私有部門，提倡法制觀念使得有權者無法控制一切，並藉由將財產轉移至私人之手，以削弱國家權力，使得私人對財富持有的重要性勝過在政府單位任職，並成爲了顯示社會地位的新指標。這些變化促使了中國推行的漸進式政治改革^⑥。

改革前，工人和農民是政府的社會基礎，並且分別是名義上的領導階級和領導階級的同盟軍，享有很高的社會和政治地位。經濟的發展改變了社會結構，中產階級和社會精英產生了。這些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日益壯大，其力量不可忽視。而工農大眾由於經濟地位下降收回了他們的政治忠誠，對政府充滿了怨恨。在二〇〇〇年初，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他認爲中共代表中國的最先進的生產力、最先進的文化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澤民特別具體談到可以吸收私有企業家入黨。但事實上，「三個代表」就是反映一黨專政下，以政治精英爲主的與經濟精英、知識精英的統一戰線，而弱勢群體（包括失業工人，貧苦農民）被擠出了政權。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研究成果」，「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稱：「私營企業主的黨員比例在二〇〇〇年已達到百分之十九點八，遠高於工農。」^⑦

中國政府認爲，保持中共的絕對領導權是維持政治穩定與統一的必要條件。正如李鵬所說的：「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無法維持國家穩定與人民的團結。」**人民日報**的社論則提到：「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就會像一盤散沙一樣，國家也會分裂，經濟建設與改革開放都不可能，因此也不會有社會穩定與人民幸福。」^⑧此外，中共宣稱其合法性來自廣大人民的委任並代表著真正的「民主」。這種民主體現在人民代表大會立法，新制定出的法規通過毛澤東的群眾路線來貫徹執行。

通過壓制獨立的工會和農會、控制媒體和司法機構、禁止集會、遊行和示威、加上黨政官員與企業主和管理人員狼狽爲奸、政府幾乎剝奪了大眾合法地表達和維護自身利益的任何手段^⑨。另一方面，中共正由一個列寧式政權轉型爲統合其他的威權政權。近年來，北京避免使用強制和高壓政策。統合主義（corporatism）和懷柔政策已成爲中共政治控制的主要方式^⑩。這種統合式的威權政權較能容忍異議團體，以及他們提出的訴求，因而擴大了政治空間。在政治上，政府在相當多的領域鬆手，不再將其觸角伸向社會所有角落。國家對公民私人生活也較少進行干預。儘管地方選舉仍然

註⑥ Sun, "Reform, State, and Corruption: Is Corruption Less Destructive in China than in Russia?" p. 17.

註⑦ 陸學藝等，**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37。

註⑧ "Li Peng Delivers Government Work Report," *China Report* (April-June 1990), p. 190; 「新歷史任務與中國共產黨」，**人民日報**（北京），1992年7月1日，第1版。

註⑨ 康曉光，「論合作主義國家」，**戰略與管理**（北京），第5期（2003年5月），頁92。

註⑩ 詳細的探討，請參見 Bruce Dickson, "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 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5, no. 4 (winter 2000-2001), pp. 517~540.

被當局操控，但仍然可能逐漸演變為真正的民主競爭園地。改革時期的中國政府也有意識地把社會精英納入體制內。越來越多地運用決策諮詢，不斷開闢民意渠道，與社會精英結成聯盟，也對大眾的呼聲作出適度回應。最近胡溫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的「新三民主義」，塑造親民務實形象，獲取共產黨傳統統治基礎——社會中下層民衆的擁戴。在政策方面，政府開始強調公正、公共開支開始向弱勢集團傾斜；如完善社會保障、保護農村和農民利益、取消農業稅、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禁止拖欠工資、實施西部開發以限制地區差距。總之，中共已由過去的獨攬權力轉為到現在與更多利益集團分享部分權益。因而，大規模、有組織的反抗政府的行動較少，學界亦日趨保守。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目前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其他「八大民主黨派」為參政黨，而非在野黨，其任務為維護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幫助共產黨加強和改善領導。這一點與其他推行「統合其他一黨獨大的政黨制度」的國家，如一九二九～二〇〇〇年的墨西哥，是截然不同的。大多數分析家認為目前尚無任何跡象表明中共在可見的未來會自動讓權的。吳稼祥在他的新著**聯邦化：中華第三共和國之路**中談到，鄧小平所說的「政治改革」，不是要在中國搞西方式的民主，而是要發揚所謂「社會主義民主」。他不會同意在中國搞三權分立和多黨競爭。他對於政改的講話圍繞的核心始終是三條：黨政分開、精簡機構和權力下放。吳稼祥和一些學者認為在中國實現邦聯制不僅僅是解決國家統一的權宜之計，更是實現政治體制轉型的啓動程式^④。

此外，如果說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改革是成功的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自改革以來中共與國內私人企業、海外資本結成一種非正式的聯盟。海外投資帶來大陸現代化急需的資金、技術、先進管理方式。國內私人企業為近年經濟增長和就業增加作出卓越貢獻。作為回報的是，中共為海外投資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潛力巨大的中國市場和優惠的投資環境。與此同時，中共改變對國內私人企業限制的政策，鼓勵他們為經濟發展效力，把保護私人財產納入憲法，並開始吸收資本家入黨以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從現代化理論的角度來看，足夠的經濟成長與自由化會使得非民主國家傾向轉型為民主國家。一個國家用以衡量經濟發展程度的指標越高，它的民主化程度也越高。工業化和都市化，伴隨著人口的集中和增加與媒體的發展，從而加快了新聞和資訊的傳播，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中產階級的出現和壯大，也會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識和參與興趣，因而民主就越有可能隨之產生。然而，各國民主轉型時機與經濟發展狀態的關係卻沒有統一的標準。舉例來說，南韓在一九八八年轉型為民主國家，當時的平均國民收入（per capita income）是五千六百零七美元。臺灣在一九八八年的時候，平均國民收入已經高達七千一百六十九美元，但直到一九九一年才出現民主轉型。在新加坡、墨西哥等號稱「民主轉型」成功的國家，他們也都是在威權政權時期締造經濟發展的

註④ 吳稼祥，**聯邦化：中華第三共和國之路**（紐約：明鏡出版社，2004年）。

成就之後才出現政治改革，從而帶來比較民主的政體。事實證明，中國社會政治方面的問題並沒有因為經濟的發展而得到解決。誠然，中國大陸的改革路徑可導致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化，但在可見的未來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的可能性甚小。

歷史表明「統合其他一黨獨大的政黨制度」終究會被多黨競爭的民主制取代。例如推行「統合其他一黨獨大的政黨制度」長達七十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在二〇〇〇年的大選中被擊敗。簡言之，自七〇年代末的改革以來，中國多年來保持了穩定與經濟成長。實現這一點中共主要是靠著「市場經濟+漸進式的改革+軟威權主義統合其他一黨獨大的政黨制度」。

三、中國模式的缺陷

美國學者 Przeworski 在 *民主與市場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一書中曾經提到，改革的「轉型成本」可能包括通貨膨脹、失業、「低分配效率」(allocative inefficiencies) 以及相對收入的變化^②。Przeworski 進而提出「轉型成本」是否能為領導人忍受的問題。長期以來，中共一直在打經濟發展牌，藉此提供一個長久繼續掌權的藉口。然而，這種做法已成爲中國發展模式的嚴重限制^③。在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共在維持長期政治穩定的情形下，在經濟成長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中國確實有理由對此感到自豪。這種將經改優先政改滯後的策略，一方面，可以繼續提供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中共繼續面臨許多嚴峻挑戰。

(一) 政治：民主與法制

短期之內，經濟自由化可以刺激經濟成長，經濟的成長確實會促進中共的政治穩定。不過，從長遠看它可能會鬆動中共的合法性。許多政治學者似乎同意，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快速的經濟成長促進中產階級等新興社會團體的崛起。當新興社會團體規模與權力不斷增加時，政權的穩定性就會受到衝擊。這些社會團體傾向提出擴大參與政府事務的政治要求，並期望分配到更多的社會財富。對此筆者同意 Dingxin Zhao 的觀點，「在任何情況下，一個政權以施政績效作爲其統治的合法性基礎時，國家必須以負責的態度看待此事。對於以施政績效爲基礎的政權來說，這是一個很沈重的負擔。」^④

根據東亞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經驗，軟威權主義只適合短期操作，而無法長期適用。以南美洲國家爲例，在一九六〇年代和一九七〇年代，「進口替代的工業化」(import-

註②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註③ 詳細的探討，請參見 Qinglian He, "China's Listing Social Structure," *New Left Review*,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0), pp. 69~99.

註④ Dingxin Zhao, "China's Prolonged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Future: Same Political System, Different Policies and Method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8 (2001), p. 441.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策略崩潰之際，「官僚威權主義」(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模式主導著整個地區的發展^⑤。但在一九八〇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之後，南美洲各地的政權幾乎都放棄「官僚威權主義」模式。在東亞國家裏，隨著經濟的發展，軟威權主義政權也逐漸被更民主的政治體制所取代。

章家敦在《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一書中提到，中國現今正朝著現代化的目標邁進之中，但人們對於未來何去何從並沒有共識^⑥。中國目前深陷於部分轉型的痛苦之中，但卻未真正享受現代化的多數好處^⑦。結果中共自己正是改革的最大犧牲者。進行改革之後，中共降低它對人民生活的干預，並且賦予人民選擇的權利，這使得中共從極權政權變成威權政權，同時失去對群眾的主導權。今日中共雖仍自稱為「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先鋒隊」，但已經很少人相信了^⑧。在中國大陸，「自由」意味人民有改善自己經濟狀況的機會，而不是政治表達的機會。政治菁英與包括知識份子以內的許多民衆錯誤地認為，中國若實行政治改革，將會引起動亂。事實上，如不真正建立民主制度，中國很可能一步步陷入動亂之中。

中國大陸的漸進式改革策略的另一個瓶頸是法制建設落後。現存的一個嚴重問題是地方政府的違法行政和暴力行政。要杜絕這種現象，首先應該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讓政府自己監督自己是不可能的。儘管華人公司擁有關係網路與在中國進行商業操盤的文化背景，可以在中國通行無阻，但一般外國投資者可能因為缺少關係網路與文化背景而望之卻步^⑨。當中國的經濟逐漸和世界接軌之時，這種獨樹一幟的體系會和「全球規範」(global norms) 發生更多的衝突。這將對中國的政治體系產生前所未有的壓力。

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是中國吸引龐大外資促進經濟發展的秘訣。儘管中共與海外投資者都高度評價政治穩定的價值，但中國也因此付出昂貴的代價。這些代價包括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缺少自由、長期存在著一個「阻礙民主進程的市民社會」(anti-democratic civil society)。工人們沒有權利組織獨立工會，唯一被政府認同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也是被政府控制的。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中共必須加速改革政府體系^⑩。然而，目前半開放的做法將使得中國無法得到中共領導人期望獲得的好處。更精確地說，這將使得中國繼續忍受發展不全之痛苦。中國領導人想利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機會迫使雇用百分之四

註⑤ 對此問題的詳細討論，可參見 Guillermo A.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Calif.: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9).

註⑥ Gordon C.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註⑦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p. 10.

註⑧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p. 10.

註⑨ Hua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forms: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rom China," p. 62.

註⑩ 引自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95.

十一的全國都市勞工的國有企業進行改革^⑤。這些國有企業長期受政府保護，但目前很多都面臨關閉的危機。這些中國工業的龐然大物缺少實施改革的動力，並未完全與時俱進^⑥。

(二) 收入分配：增長與發展 (growth vs. development)

在西方發展經濟學中「增長」與「發展」是兩個相關但截然不同的概念。增長 (growth) 一般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發展 (development) 的含義更為廣泛。一般而言，它是指隨著經濟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結構統合其他政治力量、社會結構、政治結構的變化與進步。經濟增長速度是一個國家發展進步的重要標誌，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前提條件和動力，但不標明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有增長並不一定有發展。鄧小平有一句名言「發展是硬道理」。但實際上，鄧小平主要關注的是如何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經濟「增長」，而不是含義更為廣泛的「發展」。中國經濟上的成就很顯然，但社會政治方面的問題並沒有因為經濟的增長而得到解決。衆所周知，一個收入分配懸殊的發展模式是非常脆弱而且不能持續的。

在「平等與成長孰重」的議題上，鄧小平贊同古典經濟學理論所說的「成長優先於分配」(growth-first-distribution-later)。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讓一部分的人先富起來」。文革結束後，中共追求的目標已從堅持社會主義的「平等」轉為追求資本主義的「成長」。在所得分配的問題上，中共也開始仰賴市場經濟的這只「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結果中國為了經濟成長付出收入分配失調的代價。根據世界銀行公佈中國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 高達 0.403^⑦。一般來說，數值達到 0.4 以上就超過國際上認可的危險程度。

最近由三位中國學者共同執筆的報告指出，「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不穩定的新階段。受到中國資產階級市場經濟的影響，許多中下層人民被邊緣化。急速增加的低收入群體普遍對其遭受的痛苦感到不滿。如果逃稅、貪腐和其他非法收入一同納入計算，中國大陸的吉尼係數恐怕已經超過 0.5，實在值得警惕。」^⑧事實上，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獲利最大的群體，如官僚階層已經成為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絆腳石。由此可知，中國政治體系中的各種矛盾和緊張關係將繼續存在。這也證明忽略政治改革的中國模式並非完美無缺^⑨。

註⑤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pp. 206~207.

註⑥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p. 47.

註⑦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p. 236.

註⑧ 王紹光、胡鞍綱、丁元竹，「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戰略與管理* (北京)，第 3 期 (2002 年 3 月)，頁 26~33。

註⑨ Sun, "Reform, State, and Corruption: Is Corruption Less Destructive in China than in Russia?" p. 16.

(三) 經濟改革：問題重重

對於許多人來說，中國的經濟改革絕對是壯觀的，但其通貨膨脹的壓力、銀行的死帳、急劇增長的分配不公和犯罪率等，正威脅著中國的穩定。雖然就整體而言，中國的漸進式改革仍是斐然有成，但是中國卻付出了昂貴的代價。舉例來說，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勞工階層的生計受到嚴重的衝擊。中國社會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出版的社會趨勢年度報告曾經指出，未來的幾年中國失業率將會超過百分之十五（對照政府官方所公佈的城市地區失業率為百分之三點六，非官方統計則是高達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二十）^⑤。

大量湧入中國的外國投資，對中國來說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已成為中國國內企業的替代物，而人們經常購買的中國商品其實沒有幾個是由中國本土公司生產的。中國的國有企業的比例仍然龐大，而且還臃腫並佔有其脆弱的銀行體制一筆令人恐懼的壞帳。對於中國製造業飛速跳躍發展的「深化」，在國際上有許多人認為，中國製造業是建立在高投資的基礎上，產品質量低劣、價格低廉、出口單一、利潤微薄或虧損。因而判定中國製造業缺乏長期持續發展的能力。

而在去年 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爆發後，中國發展模式的另一項缺陷浮現出來。由於政府一味追求最大限度地增加全國收入，在許多地區公共衛生和公共基礎建設完全被忽視。鑒於目前發展模式的缺陷，有些學者甚至提出中國最近二十年「有改革無發展」。

由於政治改革的進度落後於經濟改革，「尋租」（rent-seeking）和貪腐在轉型過程中被制度化。大批貪官和有裙帶關係的人迅速致富，送子女去海外留學。為了治理這些問題，中共通常訴諸於傳統的行政措施。但這些措施又會終止經濟的飛速成長，並且影響制度的建設。此外，當中國的經濟體系逐漸成為成熟的市場經濟，並且逐漸與全球經濟整合在一起，中國將急需建立公平、透明的法律體系，以便使機制更為成熟，並且和世界經濟體系更加緊密結合。為了使經濟持續成長，中國必須去建立一個透徹的法制體系，保護財產權。如此才能鼓勵產業革新、科技發展、以及增加國內外企業投資。

(四) 環境保護：被人們忽略的領域

基督科學箴言報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發表的評論文章指出，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它面臨兩個來自國內的巨大挑戰。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中國目前面臨的最大一個挑戰，可能既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政治問題，而是環境問題。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亞洲中心主任、高級中國研究員伊麗莎白·伊考諾美（Elizabeth Economy）在其新書《河流變黑》（*The River Runs Black*）中，列舉了一些環境污染對中國造成破壞的實例，並認為這種破壞會讓中國付出巨大的代價。伊考諾美估計，環境污染問題每年

註⑤ 引自“Urban Discontent,” *Economist*, vol. 363, no. 8277 (June 15, 2002), p. 13.

給中國造成的損失，應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歷史表明，任何以犧牲生態為代價的經濟成長都是難以持久的。

貪腐在各級政府都已經制度化，以及根深蒂固的社會極端不平等，社會不安和高失業率都是自由化政策失敗的有力證據。綜合上述理由，中國的改革模式從表面上看起來是極為成功的，但實際上卻存在嚴重缺陷。與成功的經濟改革相比，中共在政治改革議題上並未取得重大進展。綜觀來看，中國的改革模式令人印象深刻，但褒貶不一。在經濟領域上，中共所推動的漸進式改革，徹底改變了整個經濟體系，但政治改革成就卻是微乎其微。中國的政治腐敗，社會不平等是極為嚴重的。毫無疑問，政治體制是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之一。

然而，俄羅斯等東歐國家雖然至今面臨如何盡快發展經濟的問題，但他們畢竟已經建立了一個較好的民主政治的框架。而這個成果卻是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很難取得的成就。自一九九九年以來，俄羅斯的經濟開始快速增長，引人注目。這表示目前俄羅斯已經度過了最困難的改革時期，走出了谷底，呈現出政治穩定，經濟增長的態勢^⑦。中共基本上迴避了改革初期的轉型陣痛，但現在正在為此付出長期的代價。過去二十五年的經濟改革解決了中國能夠相對容易解決的問題，剩下的問題都是棘手的問題和一些改革造成的新問題。儘管在改革前期中國取得驚人的成就，中國改革的路徑確有其致命的缺陷。

四、中國模式可以移轉嗎？

自一九七〇年代末期起，中國逐漸從計畫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並且保持快速而持續的經濟成長。葉爾欽的震盪療法在俄羅斯失敗之後，一些評論家開始將目光轉至中國，認為中國的改革途徑是市場經濟轉型的適當途徑^⑧。毫無疑問，除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自一九七八年後，中國一直享有持續經濟成長和政治穩定。中國持續成長的經濟體系和中共的政治支配可能繼續維持一段時間。軟威權主義對古巴、北韓、越南等現存社會主義國家，以及至今經濟面臨困境的開發中國家會有所啓示。即使是北韓——世界上最教條的社會主義國家——也開始放棄一些長期以來奉為圭臬的原則，考慮實行中國在經濟改革過程中使用過的政策^⑨。據報導，二〇〇四年四月召開的中朝高峰會中，兩國首腦對新義州特區建設問題、經濟和農業改革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北韓觀察家指出，北韓已將中國的大連市作為改革開放的學習樣本。會後金正日親自前往中國農業改革的典範——北京郊區的韓村河鎮考察觀摩。

對於中國大陸是否會為其他轉型和開發中國家提供有益的經驗，學界正在進行激

註⑦ 王立新，「俄羅斯改革的中國意義」，*戰略與管理*（北京），第6期（2003年），頁18。

註⑧ 對此問題的詳細討論，可參見 Marshall I. Goldman, "Yeltsin's Reforms: Gorbachev II?" *Foreign Policy*, no. 88 (fall 1992), pp. 76~90; Gordon White,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l: A Virtuous Paradigm?"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4, no. 2 (June 1996), pp. 169~181.

註⑨ "Stitch by Stitch to a Different World," *Economist*, vol. 364, no. 8283 (July 27, 2002), pp. 24~26.

烈的辯論。有些經濟學家持肯定的態度。他們認為中國的成功表明漸進的、實驗性的、由下自上的改革途徑，遠比前蘇聯和東歐共黨國家採取的全面的、由上而下的震盪療法來的好^⑩。有些經濟學家對此觀點持有異議。他們認為中國經改的成功與中共採取的漸進的或實驗性的改革關係不大，這要歸功於中國改革開始時的特殊初始條件（unique initial conditions）。這些特殊條件如大量的農業勞力、對人民的津貼補助不足，以及較為分權的經濟體系，才是促使中國經改成功的要素。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形下成長，在某種程度上，完全是它所處的特殊發展階段，以及幸運造成的結果。從古至今，中國都是一個龐大的農業經濟。這意味著農業部門基本上可以提供過剩勞動力，投入「非國有部門」（nonstate sector），促進後者的成長。然而，這種特殊情況在其他國家並不多見^⑪。根據這種觀點，中國初始狀態的獨特性證明中國的經改經驗並非放諸四海皆準。

此外，中國還具備多數開發中國家所沒有的先天優勢——幅員遼闊，人口衆多。龐大的國內需求使得中國的經濟潛力超過日本（以出口為導向），而可與美洲大陸（以內銷為導向）相比^⑫。推行「新自由主義式的轉型」（neo-liberal transformation）的國家通常會逐漸放棄國內市場，把海外市場作為經濟成長的動力。然而，巨大國內市場的優勢使得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可以利用刺激國內需求的方式，繼續維持經濟快速發展。同時，龐大的國內市場需求量，使得中國在和外商公司商談技術的引進時，有了遊刃有餘的運作空間。中國將其國內市場作為「胡蘿蔔」，誘使外商將技術移轉給中國商業夥伴。對於國內市場規模較小的國家來說，他們無法運用這個策略。因此，他們只能增加財務誘因作為替代方案^⑬。

「海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在整個中國整合到世界經濟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國現今是世界上接受「海外直接投資」最多的地區之一^⑭。在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四年間，「海外直接投資」占中國資本的百分之七點九，到了一九九九年，這個數值增至百分之十一點七^⑮。很多資金是由散播在世界各地的華人所提供。由於中國臨近香港和臺灣，因此港臺兩地的現有資金適度提供迫切需要資金的中國大陸私營企業。若沒有華人資金的投入，中國的非國有企業會在缺乏本地資金借貸的情況下，逐漸萎縮。然而，這種特殊因素卻不易在其他轉型中國

註⑩ John McMillan and Barry Naughton, "How to Reform a Planned Economy: Lessons from China,"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8, no. 1 (spring 1992), pp. 130~143.

註⑪ Jeffrey Sachs and Wing Thye Woo,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April 1994), pp. 102~145.

註⑫ "Private Salvation?" *Economist*, vol. 357, no. 8162 (April 8, 2000), p. 7. Kenichi Ohmae 在他的新書中，認為中國的改革路徑更貼近於美國的內銷導向。

註⑬ "How Countries Go High-Tech," *Economist*, vol. 361, no. 8247 (November 10, 2001) Special Section, pp. 12~15.

註⑭ 根據北京的新華社報導，「在2002年5月中國外國直接投資的積累已超過四千億美元」，新華社，2002年5月13日。

註⑮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1*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1).

家出現^⑥。大部分的開發中國家吸收「海外直接投資」數量甚微。

此外，中國的經濟奇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賴中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單向貿易之上。鄧小平要讓中國富強，這種渴望轉化成日益增加的貿易盈餘。在二〇〇一年，中國的進出口總值達到五千零九十八億美元，其中出口占兩千六百六十二億美元，進口占兩千四百三十六億美元。中國已是世界第四大貿易體，緊追在美國，德國，日本之後。貿易盈餘使得中國擁有四千四百億美元的「外匯儲備」（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僅次於日本。

要成功的達成經濟整合和發展，必須具備一些先決條件。其中包括「有利的出口價格」（favorable export prices）和「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這樣可吸引民衆直接從事貿易或從事與貿易相關的行業。另一項先決條件是有適度控制全國資本累積的能力。然而，多數非洲國家在這方面的表現欠佳，首先，他們所接受的外國資本微不足道，國家管理外資的能力和經驗甚少。此外，非洲國家的出口集中在少數初級產品，因此難以維持有利的「出口價格」和「貿易條件」。

從歷史淵源來看，中國有史以來一直有很強的向心力和政治凝聚力。例如，中國最早建立中央集權制，有著世界最悠久的文官考核制度。大多數開發中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脫離殖民統治，把不同的語言和宗教組織聯合起來建立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些國家的國家（state）能力有限，很難產生強力政府，從而難以完全仿效中國集中力量求發展。

爲了致力於經濟的發展，中國避免一切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提出了「冷靜觀察，沈著應對；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外交思路。根據這樣的策略，北京在國際事務上不扛大旗、不出頭、不樹敵。儘管中國大陸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但它關心的事務基本上是國內事務，而非全球事務。與此同時，大陸中國保持較低的國防預算。自尼克森訪問北京以來，中美關係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市場、技術、投資已成爲中國經濟成長不可缺少的因素。目前中國已取代日本成爲美國在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北京認識到任何開發中國家要促進經濟成長，不但要依靠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而且取決於美國等西方國家是否購買他們的出口產品。然而，美國與古巴和北韓的關係在短期內難以改觀。此外，由於缺少和平的國際環境，這兩個國家的經濟資源分配不合理，在國防上耗費過多。如古巴和北韓不能化解與美國的對峙，他們很難仿效中國經改的成功經驗。相反，中共的另一盟友越南審時度勢改變與美國的對抗關係，大量吸引外資，經濟有了引人注目的發展。

雖然我們常常認爲在民主框架下的法制可以迅速建立，但實際上從社會主義政權轉型爲西方民主政治卻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從中國轉型的例子來看，這種轉型是一種漫長、痛苦、錯綜複雜的進程。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擁有許多其他開發中國家不具備的先天優勢。因此，我們並沒有充分理由認爲，中國的成功經驗可以在其他發中

註^⑥ Hua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forms: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rom China," p. 62.

國家重現。

五、結 論

在本文中，我們指出中國已經緩慢地演變為一個與西方國家鼓勵的自由民主政體截然不同的軟威權國家。同時，中國的經驗也提供從計畫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從極權主義（即所謂的硬威權主義）轉型到軟威權主義的另一條道路。然而，這個途徑並非適用於所有國家轉型的範例。同樣的，如果一個國家一味模仿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而不考慮國家之間的差異，這將是充滿風險和荆棘的道路。

要取得長期的穩定與發展，民主政治只是一個必要但非充分的條件（a necessary but insufficient condition）。舉例來說，民主政治不可能成功地解決族裔衝突和經濟衰退等問題。同樣的，威權主義下的市場經濟在短期間確實能發揮作用，但要維持經濟長期發展又必須依賴某種形式的民主化。以目前的情形來看，中國想要維持現有發展政策，將整個國家轉變成類似新加坡等東亞國家的私有市場經濟體系。為了要達到真正現代化的目標，中國必須啟動政改建立民主政治體制。由於現今只有少數人民相信共產主義的教條，中共政權實際上已經將它的統治合法性建立在道德與經濟政績之上，有時甚至建立在民族主義之上。必須指出，當一個政權將其合法性建立在政績之上的時候，這個政權在先天上就是不穩定的^{註⑦}。

儘管中國的改革付出超過預期的社會成本，但在某些外部因素的幫助下，中國的穩定與成長已經形成在一些決策者看來非常重要的發展趨勢。到目前為止，中國付出政治自由的代價，但相當成功地應付了自八九民運以來各種政治危機，避免遭受嚴重的經濟衰退。不過，這並不保證中國未來也能如此。因此，我們雖然必須肯定軟威權主義的正面意義。必須指出，中國的未來發展仍充滿了不確定性。中國在改革初期擁有許多特殊的先天優勢，中國模式有其內在侷限性和缺陷。因此，其他轉型和開發中國家的領導人在制定政策時，不宜全盤套用中國的發展經驗。

統合其他政治力量，推動經濟成長，長久地掌握政權是中共的首要目標。沿著這樣的道路前進，中國是否會真正建立民主制度。此乃人們關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有這樣三種可能：第一，如果出現嚴重經濟衰退，各種被壓制的矛盾就會爆發，整個社會便可能陷入極大的混亂。經濟危機往往會成為政治變革的催產婆。中國的「戈巴契夫」可能會應運而生，推動大規模從上至下的政治改革。第二種可能是如果中共上層不能審時度勢對政治體系進行根本的改革，繼續放慢政改的步伐，引發社會上下的不滿，有可能醞釀巨變的政治風險。局部的政治動蕩如果失控，有可能如星火燎原，席捲神州大地。第三種可能是如果中共「與時俱進」，在進一步發展經濟的同時，一方面使貧富差距有所緩和，一方面健全法制、減少腐敗，給民衆更多自

註⑦ Dingxin Zhao, "China's Prolonged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Future: Same Political System, Different Policies and Method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8 (2001), p. 440.

主權與政治空間。在未來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內，中國大陸很可能繼續維持現有的社會和政治制度。越南、古巴、北韓、前蘇聯的國家，甚至許多開發中國家會向中國獨特的試驗汲取經驗。如果「中國模式」是可持續的，那麼，它在不遠的將來會對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提出嚴峻的挑戰。顯然，這種挑戰不是來自中國的「硬力量」（hard power），而是中國的「軟力量」（soft power），即其發展經驗。

* * *

（收件：93年5月3日，接受：93年7月30日）

The Chinese Model of Reform and Its Implications

Abstract

He Li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inese model of gradual transition from a planned to a market-oriented economy and the shift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paper examines the major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path of reform including (1) growth with prolonged stability, (2) soft-authoritarianism, (3) incremental economic reform with delaye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nd (4) an inclusionary dominant party system.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enumerates the weaknesses of the Chinese reform strategy.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despite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reform, the reform has serious limitations. The government largely failed to implement significant political reforms, and because the political reform has lagged behind economic reforms, rent-seeking and corruption have become 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To mitigate those thorny problems, the government often resorts to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that cause the economy's dynamic growth to come to a halt and retar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Essentially, Beijing avoided the pai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but is paying the long-term price now.

The third part of the article deals with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reforms for other transi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hinese reform has resulted in fast and continuous growth.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failure of Yeltsin's shock therapy, some argue that China might have invented a preferable approach, i.e. gradual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due to different initial conditions for reform and unique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external factors, China cannot serve as a comprehensive blueprint--in terms of policy measures and performance criteria used to evaluate those policies--for other transi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is insufficient to

suggest that the Chinese economic miracle will be repeated in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words: economic reform; political reform; development; stability; democratization

參考文獻

- 王立新，「俄羅斯改革的中國意義」，*戰略與管理*（北京），第6期（2003年6月），頁15~20。
- 王紹光、胡鞍綱、丁元竹，「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戰略與管理*，第3期（2002年3月），頁26~33。
- 李曙光，「中國的經濟轉型：成乎？未成乎？」，*戰略與管理*，第3期（2003年3月），頁17~25。
- 吳稼祥，*聯邦化：中華第三共和國之路*（紐約：明鏡出版社，2004年）。
- 徐斯儉，「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爭議：一個文獻的回顧」，*中國大陸研究*，第47卷第1期（2004年1~3月），頁1~39。
- 孫立平，「權利失衡、兩級社會與合作主義憲政體制」，*戰略與管理*，第1期（2004年1月），頁1~20。
- 肖功秦，「新加坡的『選舉權威主義』及其啓示」，*戰略與管理*，第1期（2003年1月），頁67~74。
- 胡鞍綱，*中國戰略構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 洪朝暉，*中國特殊論：中國發展的困惑和路徑*（紐約：科捷出版社，2004年）。
- 秦暉，「中國轉軌之路的前景」，*戰略與管理*，第1期（2003年1月），頁1~20。
- 康曉光，「未來三—五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戰略與管理*，第3期（2002年3月），頁1~15。
- 康曉光，「未來10年中國政治發展策略探討」，*戰略與管理*，第1期（2003年1月），頁75~81。
- 康曉光，「中國特殊論—對中國大陸25年改革經驗的反思」，*戰略與管理*，第4期（2003年4月），頁56~61。
- 康曉光，「論合作主義國家」，*戰略與管理*，第5期（2003年5月），頁85~95。
- Chang, Gordon C.,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 Bunce, Valerie,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4 (2001), pp. 43~65.
- Burns, John P.,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50: National Political Reform," *China Quarterly*, no. 159 (September 1999), pp. 580~594.
- Dickson, Bruce, "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 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5, no. 4 (winter 2000-2001), pp. 517~540.
- Friedman, Edward, "Is China a Model of Reform Success?" in Edward Friedman 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Socialist China*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pp. 188~207.
-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1989), pp. 3~18.

- Fukuyama, Francis, "Asia's Soft-Authoritarian Alternative,"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vol. 9, no. 2 (spring 1992), pp. 60~61.
- Goldman, Marshall I. "Yeltsin's Reforms: Gorbachev II?" *Foreign Policy*, no. 88 (fall 1992), pp. 76~90.
- He, Qinglian, "China's Listing Social Structure," *New Left Review*,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0), pp. 69~99.
- Henning, Christian and Xiaobo Lu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Style Gradualism: A Paradox of Too Strong Private Interes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 156, no.1 (2000), pp. 35~59.
- Huang, Yashe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forms: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rom China," *Cato Journal*, vol. 21, no. 1 (spring 2001), pp. 43~64.
- Lau, Lawrence, Qian Yinyi, and Gerald Roland, "Reform without Losers: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ual 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8, no. 1 (February 2000), pp. 120~143.
- Li, Cheng, *Rediscovering China, Dynamics and Dilemmas of Refor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7).
- Li, He, "Middle Class: Friends or Foes to Beijing's New Leadership?"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no. 1-2 (fall 2003), pp. 87~100.
- Lin, Justin Yifu, Fang Cai, and Zhou Li,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rev. ed.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McMillan, John and Barry Naughton, "How to Reform a Planned Economy: Lessons from China,"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8, no. 1 (spring 1992), pp. 130~143.
- Nathan, Andrew J.,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2003), pp. 6~17.
- O'Donnell, Guillermo A.,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Calif.: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9).
- Pan, Wei, "Toward a Consultative Rule of Law Regime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2, no. 34 (February 2003), pp. 3~41.
- Pei, Minxin,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rzeworski, Adam,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Shen, Raphael,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 Experiment in Pragmatic Socialism*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0).
- Sachs, Jeffrey and Wing Thye Woo,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April 1994), pp. 102~145.
- Sautman, Barry , “Sirens of the Strongman: Neo-Authoritarianism in Recent Chinese Political Theory,” *China Quarterly*, no. 129 (March 1992), pp. 72~102.
- Shirk, Susan L., *How China Opened its Door: The Political Success of the PRC's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Reform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 Shlapentokh, Dmitry, “Post-Mao China: An Alternative to ‘The End of History?’” *Communist &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5, no. 3 (September 2002), pp. 237~268.
- Sun, Yan, “Reform, State, and Corruption: Is Corruption Less Destructive in China than in Russi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2, no. 1 (October 1999), pp. 1~20.
- White, Gordon,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l: A Virtuous Paradigm?”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4, no. 2 (June 1996), pp. 169~181.
- Wu, Yu-Sh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a vs. Europe,” *Issue & Studies*, vol. 38, no. 4/vol. 39, no. 1 (December 2002/March 2003), pp. 93~138.
- Zhao, Dingxin, “China’s Prolonged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Future: Same Political System, Different Policies and Method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8 (2001), pp. 427~444.